

台灣社會中的犯罪控制：比較社區中的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之效應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以社會解組理論為基礎，主要在比較Bursik 與Grasmick，以及Sampson與其同事用來解釋社會解組與偏差行為之間的不同機制，而提出的系統模式(systemic model)與集體效能概念(collective efficacy)做討論。此兩理論最大的差異在於系統模式強調社會連結的重要性，集體效能則認為社會連結為非必要的。雖然目前有關集體效能的相關複製研究在全球，如Los Angeles、Australia、United Kingdom、Hungary、Tanzania、Colombia、Sweden等不同國家進行 (Sampson, 2012)，然而，這一系列的研究都是以西方國家為主，並沒有考慮到文化的差異。此外，以往有關集體效能與社會連結的比較研究也是以芝加哥地區資料為主 (Sampson, Raudenbush & Earls, 1997; Morenoff, Sampson & Raudenbush, 2001)。

因此，本研究以台灣的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地區為主，檢驗是否不同研究地區、東西文化差異會影響研究結論。使用多元迴歸分析，檢驗集體效能與社會連結對於個人被害恐懼感，以及知覺到的環境失序的影響。結果顯示，集體效能對於個人的犯罪被害恐懼皆沒有影響，但研究結果也發現，集體效能中的社會凝聚力與信任能夠顯著負向預測個人知覺到的環境失序、集體效能中的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則是顯著正向預測個人知覺到的環境失序。另一方面，社會連結則是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以及知覺到的環境失序完全沒影響。

英文摘要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scholars have begun to assess how social control mechanism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concentrated disadvantages on crime rates. Some scholars have found that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so-called collective efficacy) matter more than relational ties in preventing crime (Sampson et al., 1997). To date, studies that examine the effects of collective efficacy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disorder and likelihood of victimization have mostly been undertaken in western countries. But a study examining the impacts of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social ties in a non-Western society can help us understand how they affect local problems and individuals' perceptions across different cultural settings. To fill the gap in literature,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social ties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on residents' fear of crime and perceived neighborhood disorders,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three cities (Taipei, Taichung, and Kaoshiung) in Taiwan.

It was found that social cohesion and trust was nega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residents' perceived neighborhood disorders. On the other hand, shared expectations for social control were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erceived neighborhood disorders. It was also found that social ties were not related to residents' fear of crime or perceived neighborhood disorders.

一、前言及研究目的

計畫主要目的在檢驗社會解組理論中的兩個重要概念——社會連結(social ties)與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 對犯罪的影響——並以實證資料驗證何者方為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

社會解組理論主要可分為兩大流派，一者為社會連結模式，主張社區中的友誼與親屬網絡可提供個人歸屬感，加上緊密的人際互動，使得個人的行為得以被有效的控制，而不致於偏離行為準則（Bursik & Grasmick, 1993）。另一派則主張近代社會中，人際關係疏離已為常態，因此，社會連結為主的概念不再適用，社區的集體效能高低與共識才是重點（Sampson et al., 1997）。集體效能包含社區居民間的相互信賴關係，以及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此派主張：無論社區中的人際網絡如何，只要社區居民目標相同，社區的集體效能提高，犯罪率自然下降。

近來有許多實證研究指出，集體效能是重要的社會控制機制，社會連結並不是主要因素。然而，以個人主義為本的集體效能概念，在著重人際網絡的台灣社會中，是否可被直接應用；或者，台灣社會的重要社會控制因素，會不會跟西方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存在？

本研究預計以問卷調查法，蒐集居民對於環境中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的強度知覺，並完整測試社會解組理論在台灣的應用價值。研究結果將提供理論學家、政策制訂者、社區實務工作者、以及社會大眾參考，俾以瞭解社區的人際網絡、凝聚力以及共識對於該地區被害恐懼，以及知覺到的環境失序影響，進而對於理論的跨文化驗證與應用，提供實證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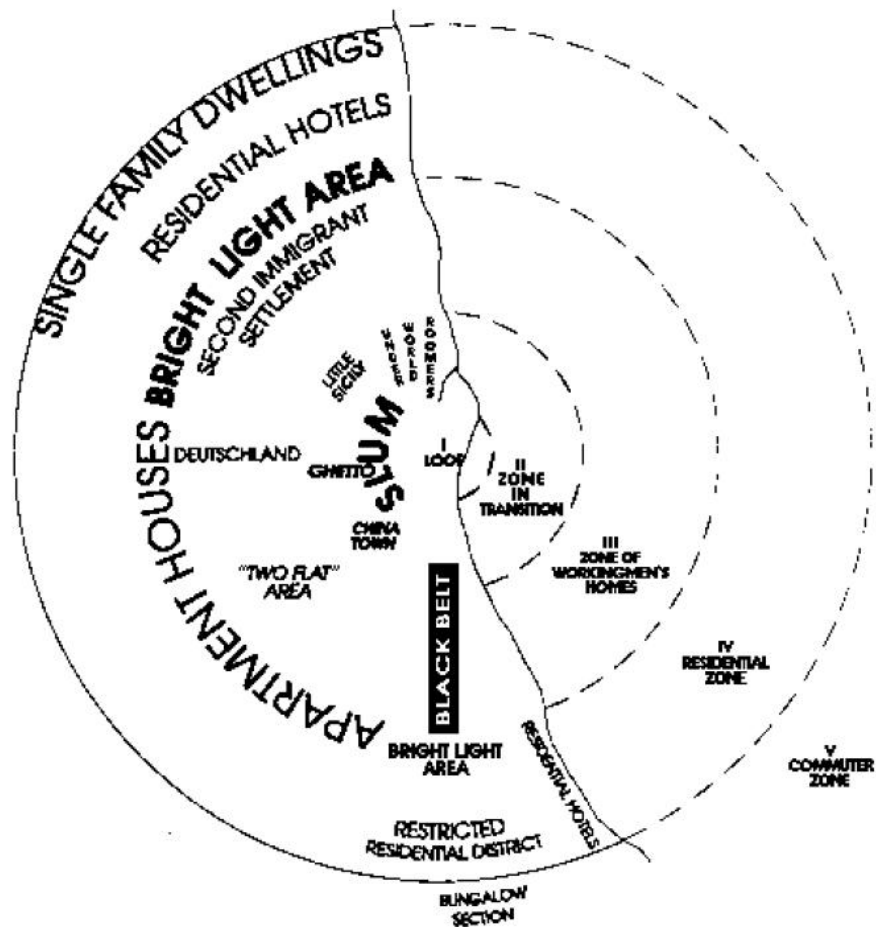
二、 文獻探討

(一) 社會解組理論

社會解組理論是屬於以地方為基礎(a place-based)的犯罪學理論。Park 與 Burgess 於 1921 年受到城市生態學(urban ecology)的影響，他們發現城市中的犯罪分布與環境有密切的相關(圖 1)。Burgess 特別指出城市就像是一個自然系統(natural system)，每一個區域都會成長，從中心開始朝向下一個區域移動，同心圓的最中心為 Zone I，為商業中心；Zone II 稱為過渡區域，一般為城市中最凌亂老舊的地區，通常為貧窮的新移民者於此區安頓；Zone III 為藍領工人的住宅區，住的房屋、公寓不大，居住此區域通常為在 Zone II 的工作的人居住在此區域；Zone IV 為住宅區，為獨棟住宅單位及較昂貴的公寓；Zone V 為通勤區域，通常居住在 Zone IV 與 Zone V 地區的都是經濟狀況相對較為良好的居民(蔡德輝、楊士隆 2012：78)。因此隨著城市的發展，這五個區域便會如同自然環境中的野生植物的擴張過程一樣，由中心朝外進行「入侵、統治、取代」(invasion, dominance, and succession)的過程 (Cullen & Agnew, 2006; Vold, Bernard & Snipes, 2002)。

以 Park 與 Burgess(1921)所提出的同心圓地帶理論為基礎，Shaw 與 McKay (1942)於芝加哥地區進行偏差行為分佈的實證研究。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偏差行為的分佈是受到城市中的經濟發展分佈所影響，並提出三個主要的結構因素來解釋犯罪與偏差行為的發生。第一，鄰里地區的物理環境衰頹較容易會有高犯罪率，在這樣的地區人口也是處於減少以及外移的狀態。第二，有較高犯罪率的地區，較容易會有集中弱勢(concentration of disadvantaged)的情況，如居民較貧窮，或是需要依賴社會福利。第三，犯罪率較多的地區通常也有較多移民聚集，人口異質性較高。Shaw 與 McKay 也同時指出，不論居民組成的改變，一個地區的犯罪率趨向於穩定的狀態，也就是說環境的特徵會造成犯罪的發生。

圖1. 芝加哥同心圓模式



Source: Burgess (1925 [1967])

(二)社會解組理論的變革

社會解組理論在二十世紀中期已漸取代生物學或心理學理論來探討少年犯罪行程之因素(蔡德輝、楊士隆，民 101，頁 80)，但因為其理論的缺失，使得社會解組理論的相關討論於 70 年代開始式微。1978 年，Kornhauser 出版 *Social Sources of Delinquency*，他深入剖析社會解組理論並指出，社會解組理論應該是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機制來解釋為什麼一個地區會有犯罪的產生，分別是文化偏差(culture deviance)，以及社會解組(social disorganization)。文化偏差模式認為，造成偏差與犯罪行為的主因是社區內的次團體文化與主流社會規範的差異所造成。而社會解組模式則是認為，偏差與犯罪行為的產生是因為社區內結構的衰頹，阻礙了社區中居民行使控制和實現共同目標的能力，因而產生犯罪行為。根

據社會解組理論的兩個不同機制來看，Kornhauser 認為 Shaw 與 McKay 並沒有清楚解釋社會解組產生偏差行為之機制，應該要從控制的觀點來解釋犯罪行為，因此提出社區控制模型(community control model)，來解釋為什麼社區結構問題會造成犯罪的產生。也就是說，當一個社區處於貧窮、高人口異質性、高人口流動率時，居民之間無法建立有效且穩定的關係去達到共同目標，社區並沒有能力去控制居民的行為，因此便會產生犯罪問題。

除了 Kornhauser 之外，也有其他的學者針對社會解組理論提出實證研究上的質疑。如 Bursik 與 Webb(1982)針對 Shaw 與 McKay 所提出的犯罪穩定性提出質疑，同樣使用 Shaw 與 McKay 的原始資料重新檢驗在 1940-1970 年間偏差行為的分佈模式是否會維持穩定，但結果發現芝加哥地區鄰里環境結構的穩定性是僅限於 1930-1940 年間，之後因經歷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黑人人口的移入，人口種族生態結構發生激烈改變，因此 1950-1960 年間犯罪率不再穩定，不同地區的偏差行為改變甚鉅。

為了解決社會解組理論所面臨的解釋效力的批評，Hunter(1985)、Bursik 與 Greshmick (1993)，以及 Sampson 與其同事(1997)皆提出了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概念加入理論中，也就是說將不同程度的社會控制做為社會結構與犯罪之間的調解機制。以下分別討論之。

(三) 系統模式 Systemic Model

Bursik 與 Grasmick 於 1993 年以 Kasarda 與 Janowitz (1974)針對鄰里地區所提出的系統模式(systemic model)做為基礎架構，來討論鄰里地區和犯罪之間的關聯性。將親屬關係以及社會連結加入社會解組理論當中。將社區視為一個複雜的友誼與親屬網絡，包含了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連結，對居民來說這些社會連結是家庭生活的基礎，並且在孩子的社會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Kasarda & Janowitz 1974, p. 329)。因此，居住時間的長短就被視為重要的決定因素，用來討論居民對於社區的歸屬感，若居住的越久，他們對於社區的連結也越深。

除了強調社區中的人際關係，Bursik 與 Grasmick 也加入了 Hunter 於 1985

年所提出的系統控制想法到理論當中。也就是說，在社區中包含了三種不同的社會控制力量：低階的社會控制為 private level，為非正式的親密團體控制力量，如家人、親戚與同儕，強調的是與親友之間的關係。第二階段為 parochial level，個人的地方網絡與地方機構，如商家、學校、教堂、志願服務機構等，強調的是與鄰居之間的關係，缺少與親屬之間的感情連繫。第三階段為 public level，利用地方以外的力量幫助維持社區，為較正式的社會控制，如社會服務機關、警察局等(Bursik & Grasmick, 1993, 2001)。Bursik 與 Grasmick 認為社會控制力量是來自於居民間緊密的社會網絡所產生，因此當人際關係網絡破碎，社區中就容易產生犯罪問題(Bursik & Grasmick, 2001, p.18)

(四) 集體效能 Collective Efficacy

Sampson 與其同事則是從另一個方向來討論社會解組理論，他們認為僅強調社會結構是不足夠的。Sampson 與 Groves (1989) 針對英國(Great Britain)238 個社區，來檢驗社會解組與社會控制力量對於暴力犯罪(街頭搶劫與陌生人的暴力攻擊)及財產性犯罪(住宅竊盜、汽車竊盜與故意破壞公物)的影響。他們使用地方友誼網絡、控制青少年同儕團體的能力，以及參加地方的志願組織來測量非正式社會控制力量。他們認為一個地區如果社經地位較低、人口異質性較高，以及人口移動率較高，會造成這個地區居民彼此之間沒有穩定的人際關係可言，也就造成參與地方組織的意願低落。因此，居民之間薄弱的關係將會阻礙居民共同維護社區秩序的社會控制力量，也就會造成犯罪與偏差行為。

根據 Sampson 與 Groves (1989)研究結果也發現，若社區中有較緊密的友誼網絡、居民對於地方的組織參與度愈高、對青少年同儕團體的監督越有效，社區中的住宅竊盜、街頭搶劫，以及對陌生人的暴力攻擊事件都會較低(p.790)，這樣的結果證明了社區中的社會連結網絡對於影響社區犯罪率有其重要性。

然而系統模式所強調的“社會連結”亦有其問題存在(Sampson, 2012)，緊密的社會連結有時反而會影響到社會控制的建立。如 Browning、Feinberg 與 Dietz (2004)研究所提到的，在低社經地位或是犯罪機會充斥的社區，密集社會連繫有

時反而會增加犯罪發生，犯罪者可能因為他的家人朋友與社區的良好連繫關係，而間接的受惠得到保護；或是犯罪者直接與社區居民進行交流，如贊助街區活動等，而換取了一定的保護。第二，密集的社會連繫不一定會如預期的有正向的結果，根據 Granovetter (1973, 1983)的研究，將社會連繫區分為弱連結(weak ties)與強連結(strong ties)兩種，結果即顯示弱連結對於找工作的幫助比較大，也就是說，有時候人際之間的親密連繫較少，反而較有助於拓展社會資源的網絡。第三，在都市化之後，受限於地理環境的改變，例如高樓大廈的建築模式，影響到社會連繫網絡的發展。也就是說，隨著城市的發展，對於許多城市中的社區而言，良好的社會連結已經不再是主要的人際關係準則。Sampson 開始轉移研究重心，重新思考社會控制這個概念，但不再討論社會連繫或是組織關係(Morenoff, Sampson & Raudenbush, 2001, p. 520)。他認為真正重要的是社區居民所共享的前景，因此他提出集體效能的概念(Sampson et al.,1997)。

社區中的集體效能，就如同個人的自我效能，是一個社區中的重要因子讓居民能夠去達到集體的目標，也就是讓犯罪不再發生。也就是說，集體效能指的是社區本身的維持公共秩序的能力，奠基於社區居民的凝聚力與互相信任，以及樂於參與公共事務。如果一個社區有較多的資源、同質性較高，人口移動率也較低，那麼這社區便較容易產生高的集體效能，居民會較願意參與公共事務、當社區中有問題發生時會更願意去處理、

Sampson 與其同事於 1997 年以集體效能的概念，來研究芝加哥 343 個鄰里地區的暴力犯罪率。Sampson 將集體效能分成非正式社會控制(informal social control)，以及社會凝聚力與信任(social cohesion and trust)兩部分來討論，除此之外，也同時加入了鄰里服務(neighborhood services)、友誼及親屬連結(friendship and kinship ties)，以及組織參與(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來討論檢驗對於暴力犯罪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緊密的友誼與親屬連結、組織參與，以及鄰里服務對於殺人犯罪皆沒有影響。但集體效能卻能夠顯著地降低暴力犯罪，也就是說居民之間的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以及非正式社會控制力越高，社區中的暴力犯罪也就

越低。

到了 2001 年，Morenoff 等人，將 Sampson 等人(1997)對於集體效能的解釋做了更進一步的更改。由原先所討論的兩部分非正式社會控制，以及社會凝聚力與信任，改為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shared expectations for social control)，與社會凝聚力與信任(social cohesion and trust)。由“非正式社會控制”改為“對社會控制有共同的期待”這樣的轉變來看，集體效能更強調的是社區中居民具有共同的目標和價值觀，並且在有需要的時候去干預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認為社區中的緊密人際關係，亦即原指稱的社會連結，並非必要的概念。

為了更清楚的比較出集體效能與社會連結對於社區犯罪的影響，Morenoff 等人(2001)將芝加哥的鄰里社區分為以下四種組合：低連結-低效能、低連結-高效能、高連結-高效能、高連結-低效能，結果發現殺人犯罪的熱點是位於低連結-低效能(low ties- low efficacy)，以及高連結-低效能(high ties- low efficacy)，也就是說在高集體效能的社區能顯著降低殺人犯罪。其他如加入社區的地方組織、是否有親戚或好友住在同一社區當中，對於殺人犯罪皆沒有影響。由這樣的結果來看，社區中真正較重要的是居民具有相同的目標與期待，並且願意參與，以及關心公共事務，而非社區中朋友親人的數量。

(四) 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

系統模式的社會控制概念(Bursik & Grasmick, 1993)以及集體效能(Sampson et al., 1997)的提出主導了近代社會解組理論的發展。而其中系統模式所強調的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為兩個極為相似卻又不同的重要概念 (Gibson et al., 2002)。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的概念皆認為社區結構的弱勢對於社區居民有負面的影響，這樣的影響會導致社區中的社會控制力量減弱，因為缺乏社會控制力量，便無法有能力防範犯罪的發生。然而，他們概念的差異在於這中間的調節機制。

Bursik 的系統模式相信，社會連結或是人際關係的存在對於預防犯罪的發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社會連結是被視為社區結構與社區行為間的必要調節機制(Warner, 2007, p.104)。Bellair (1997)提到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會增加社

區的非正式控制力量，因此降低犯罪的發生。Bellair 選擇美國六十個城市，研究這些城市居民的社會互動對於住宅竊盜(burglary)、汽機車竊盜(motor vehicle theft)與搶劫(robbery)犯罪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社會互動對於整體的犯罪率有顯著的影響，整體犯罪率是較低的。然而，有關社會連結的研究結果可能會因為不同的種族、社經地位、犯罪類型，以及性別而有所差異。例如，Sampson 與 Groves (1989)針對芝加哥地區所做的結果顯示地方的社會連結能夠降低住宅竊盜(burglary)，然而 Warner 與 Rountree (1997)針對西雅圖地區所做的研究結果是發現，在白人為主的社區，地方的社會連結能夠降低攻擊(assault)的發生，Rountree 與 Warner 於 1999 年延續此研究並針對性別去討論則發現，僅有女性間的社會連結能夠降低攻擊事件的發生。

有鑑於社會連結力量的式微，以及從實證研究結果來看，社會連結對於犯罪發生的解釋力是較不一致的。Sampson 認為都市化發展，造成人際關係發生變化，彼此之間已不需要有更親密的連結，即使有足夠的時間，居民也不見得會想要與鄰居當好朋友(Sampson, 2012, p. 151)。許多研究也發現，現代的居民傾向去參與社區組織活動，以及與警察合作，依賴正式的社會控制力量，而非傳統的人際網絡，來維持社區的秩序(Bennett, 1995)。Carr (2003) 也同樣指出因為鄰里彼此關係的疏離，社區中的居民變得不想去插手他人事務，大部分居民認為如果去管教在街上成群的青少年會受到少年父母的指責，而不願意以個人身分處理有關社區中的事情，而是想要以組織中的一員去參與(p.1252)。因此，Sampson 等人的集體效能的概念較符合現代都會生活的型態，不強調人際關係連結(Morenoff et al., 2001, p.520)，強調的是因共同價值觀而顯現的社會凝聚力、相互信任，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

(五) 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在台灣的应用

在比較集體效能與社會連結對於犯罪與偏差行為的影響時，許多研究皆發現集體效能對於解釋犯罪與偏差行為的能力是較好的，並同時指出社會連結對於控制社區犯罪是沒有影響的(Browning et al., 2004; Mazerolle, Wickes & McBroom,

2010; Morenoff et al., 2001; Sampson et al., 1997; Simons et al., 2005)。然而，基於以下幾點理由，我們認為社會連結的概念值得被重新考量。第一，仍是有其他學者重視社會連結的存在，並證實社會連結對於社區犯罪的重要性(Warner & Rountree, 1997; Rountree & Warner, 1999; Bellair, 2000)。另外，並非在每個地區的研究都支持 Sampson 的研究結果，例如 Sutherland、Brunton-Smith 與 Jackson (2013)在倫敦的研究便顯示雖然集體效能與暴力犯罪為負相關，但相關微弱(p.1061)，此外若加入社區的環境因素來看，集體效能並無法成為社區結構弱勢與犯罪之間的中介變項。Juan (2013)則是發現在美國西雅圖，不論是社會連結或是集體效能對於犯罪率皆沒有影響。第二，大部分關於集體效能的研究皆是使用蒐集自美國芝加哥地區的 PHDCN 資料(Browning, 2002; Browning et al., 2004; Morenoff et al., 2001; Sampson et al. 1997)。雖然目前有關集體效能的研究除了針對芝加哥地區之外，相關的複製研究也在全球，如 Los Angeles、Australia、United Kingdom、Hungary、Tanzania、Colombia、Sweden 等不同國家進行研究(Sampson, 2012)，然而，這一系列的研究都是以西方國家為主，並沒有考慮到文化的差異。

雖然在西方社會，是以個人主義和客觀的道德價值觀(individualism and objective morality)為主，但對其他文化來說，社會連結仍是非常重要的(Bedford & Hwang, 2003; Kwak, 2012)。Bedford 與 Hwang (2003)提到，東方社會中是以關係為基礎(relational based)，所有的道德標準義務皆是根據自己所屬的社會網絡，因此行為準則是強調積極義務(positive duties)，以及他們的行為對於所屬的社會網絡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因此，對東方社會來說，緊密的社會連結為重要的社會控制機制來預防個人不去從事犯罪行為(Kwak, 2012)。

Bian 與 Age (1997)也指出中國文化非常強調關係(relation)的重要性，關係是做為經濟與社會組織的指導原則(p.983)。在中國文化中，遠近親疏的分別是很重要的，對於陌生人，因為沒有親誼，他們不認為有任何義務需要去照顧陌生人(Cheng, 1991)。所以當你詢問中國人能不能幫忙做某件事情的時候，他們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我們的關係是什麼?”(Hwang, 1987)。Hwang 將關係分成三個不

同層次來討論：情感性的連結 (expressive tie)，功能性的連結 (instrumental tie)，以及混合連結 (mixed tie)。其中，功能性的連結是較接近於集體效能的概念，因為功能性的連結強調的關係是基於有目的性的連結，所以在這樣的關係中也可以不需要知道他人的名字或是做朋友，當任務結束關係也就結束，例如賣家和買家。但問題是，在東方文化的脈絡中，要怎樣的關係才足夠讓大家共同參與公共事務、互相幫助，或是一起維持居住社區的秩序？

如前所述，Sampson(2012)不認為密集的社會連結一定會帶來正向的結果，如同 Granovetter(1973,1983)研究所提到的，弱連結(weak ties)比強連結(strong ties)更能夠協助求職者進行轉職。然而，在 Bian(1997)，以及 Bian 與 Age (1997)的研究中卻發現在中國與新加坡，大部分的人依賴強連結來轉換工作，以獲得相關資訊以及影響力，在找工作的時候的確是要透過強連結會比弱連結容易許多 (Bian,1997, p.373)。會有這樣不同的結果差異，是因為關係在華人社會結構中扮演了三個角色：提供熟悉與親密感、信任感，以及互惠義務(Yang, 1994, as cited in Bian, 1997; Bian & Ang, 1997)。其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互惠義務。因此，對華人來說弱連結缺乏強連結所賦予關係的那種信任以及義務。而不論是集體效能，或是包含在關係中的功能性的連結，他們都缺乏了道德義務在其中，因此，這樣的連結關係或許不足以讓華人能夠主動的參與社區中的公共事務。

不過，事實上社會連結的影響也是有不同面項的(Bian & Age,1997, p.1002)。如同 Sastry 與 Ross (1998)提到的，文化並非全然的個人或是集體主義，只能說是相較起來存在較多或是較少的成分在其中。不論是集體效能或是社會連結都可能因為不同的地區，或是研究對象而有差異。像是雖然是在西方國家，但 Ericksen 與 Yancey(1977)在美國費城的研究是發現社經地位較低的人，可能因為缺乏經濟與社會的支持，他們是傾向會較依賴強連結的幫助(as cited on Granovetter, 1983, p.212)。因此，雖然亞洲比西方更偏向集體主義的文化特性，但也不能一概而論，認為在西方社會中社會連結就一定是不重要；或認定在中華文化的脈絡下社會連結就一定是最重要的概念。然而，在東方文化中，關係所賦予的道德責任義務，

是受到從小父母的教導或是社會訓練學習結果(Early,1993,p.323)。這樣從小習得的文化是否會如同 Morenoff et al.(2001)與 Sampson (2004)所說，隨著都市化的發展，地理上的限制例如摩天大樓的出現而限制了社會連結的發展？根據 Zhang、Messner 與 Liu(2007)在天津所做的研究結果，發現集體效能能夠降低居民的住宅竊盜被害經驗。但在此研究中，他們並沒有加入社會連結做討論，是僅針對集體效能做研究。但於 2009 年，Zhang、Messner、Liu、Zhuo 的研究是發現，在中國社會中社區中良好的關係是會減少居民的被害恐懼感，而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以及非正式社會控制是沒有顯著的。

而同樣屬於東方文化脈絡下的台灣，在針對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的研究部分是相當少的。Weng (2007)在台灣研究集體效能對於社區居民被害恐懼的影響，然而其研究結果有幾點問題。第一，在 Weng 的研究中並沒有清楚區別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的概念，甚至是將此兩概念混合來測量。第二、Weng 僅使用兩個問題-是否會介入鄰居對孩子的體罰行為，以及對鄰居的信任程度來測量集體效能。這樣的測量方式可能太浮面而無法代表台灣目前社區中集體效能的現狀。此外，根據 Weng 的研究結果是顯示社區中的集體效能越高，居民的被害恐懼感也會越高，這樣的研究結果是與國外針對集體效能所做的結果是相反。Weng 對此提出可能解釋是因為集體效能的測量無法抓住東方社會對於社區團結、守望相助的精神，台灣地區的人民對於社區的理解想像與國外不同，而導致這樣的結果(p.138)。由此可知，有關集體效能在台灣的研究是有必要再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與討論。

除了 Weng(2007)的研究以外，石友馨(2008)的研究是探討父母的教養行為以及社區中的集體效能對於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其研究結果是發現集體效能能夠降低青少年的偏差行為。但石友馨的研究是僅針對台北市做研究，並且未比較社會連結的影響，僅針對集體效能做討論。因此，本計畫將進一步針對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台灣三個主要大城市進行研究，比較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對居民被害恐懼，以及居民對社區失序知覺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 計畫問卷之設計與審查

本計畫編制的問卷主要參考美國 David Weisburd 與 Brain Lawton 教授執行的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 調查計畫的問卷。問卷內容同時參考 Terance D. Miethe 教授的 Testing Theories of Criminality and Victimization in Seattle, 1960-1990 計畫問卷、瞿海源教授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報告第三期第三次問卷、伊慶春教授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三樣本第一波青少年問卷、國一樣本第三波家長問卷、國三樣本第四波家長問卷、國一樣本第六波家長問卷、以及許春金教授的少年偏差行為早年預測之研究第三年少年部分問卷題目，新增與相關之題目至問卷當中。

本計畫主要採用翻譯國外問卷之方式，再蒐集台灣資料新增相關問題至問卷當中。於問卷翻譯之過程中，已將部分題目根據台灣情況做修改，但為確認問卷題目於台灣施測之適切性，以及新增之問題是否合適，於問卷編製完成後，邀請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許春金教授，以及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陳玉書副教授擔任審查委員，針對問卷內容給予建議與指導。參考兩位審查委員之建議，針對問卷內容最做修改，完成問卷之設計。

問卷分為訪談問卷，以及郵寄問卷兩種。訪談問卷包含了社區參與/社會互動、公共空間的使用、安全感、犯罪恐懼感、對犯罪與失序行為的知覺、被害情況、警察的合法性與程序正義、社區中藥物與酒精消費情況、犯罪與自我控制，以及個人基本資料，十個部份，共有 172 題。郵寄問卷部分，為避免題目過長降低填答者的填寫意願，以及避免問卷在回寄過程中被意外開啟而洩漏填答者的個人隱私，於郵寄問卷題目部分進行刪減。郵寄問卷題目包含詢問填答者的社區參與/社會互動、公共空間的使用、安全感、犯罪恐懼感、對犯罪與失序行為的知覺、被害情況，以及個人資料，七個部分，共 48 題。在訪談問卷中出現的如詢

問使用毒品、性交易、性伴侶人數、使用保險套、有無感染性病或愛滋、自殺傾向、毒品使用和販賣、是否曾有犯罪行為以及入獄等敏感的個人資訊問題皆無出現在郵寄問卷當中。

為配合國科會促進研究計畫對計畫參與者權益之推動，本計畫於問卷編制完畢後向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申請研究倫理審查。於 103 年 5 月通過審查開始執行(詳見附件一)。由於原計畫主持人楊曙銘因職務調動因素，至美國喬治梅森大學任教，因此本計畫轉移給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朱群芳教授，此項主持人變更已獲科技部同意(見附件二)，並也通知成大倫審會申請計畫主持人變更通過(見附件三)。

(二) 進行預試

以嘉義縣民雄鄉做為預試區域，隨機挑選民雄地區八條道路，每條道路分別發放 20 份問卷，總共寄送出 160 份問卷，自寄送出問卷後，預計使用兩週時間來回收問卷。兩週後統計寄送回來之問卷份數，以此標準來調整正式施測預計寄送的問卷數量，並根據回收問卷內填答者所給的意見回饋，將問卷進行修改後做為正式施測問卷。

寄出的 160 份問卷，在兩個禮拜的時間內共有 39 份問卷寄回，其中三份為拒收退件，另三份為查無地址，有效問卷僅 33 份，回收率僅約 20%。就題目數量部分，有 72% 填答者表示數量適中，22% 表示題目數量過多；題目回答的難易程度部分，88% 填答者皆表示題目容易作答。由預試之回收問卷發現最大的問題在於，填答者中有 48.5% 皆不住在我們寄去的地址，只有 51.5% 的填答者表示是居住在我們寄送的地址。這表示問卷幾乎有一半是寄送到住商混合的地址，或是商店的地址，無法確認填答者實際居住的地區，以及填答者的回答是依據自己的住家附近的環境狀況作答，或是以工作地點的環境來回答問題。

會有這樣的問題在於，本研究是以縣市提供的門牌檢索系統隨機挑選地址寄送，因此無法完全確定此地址是否為一般民宅。在填答者的回饋當中也有提到，

應該要釐清詢問的是工作地點或是住家的環境狀況。因此，在正式寄送的問卷中新增題目確認與了解此份問卷寄送到的地址是否為住家地址，若非住家地址則提醒填答者能夠以住家之環境狀況做回答，並且能夠提供我們填答者所居住的區域，以利之後研究分析的進行。

(三) 正式施測

1. 本計畫為針對台灣主要城市：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進行抽樣。首先依照侯佩君等人(2005)所做的台灣地區 358 鄉鎮市區分類，其研究根據不同的發展特性將鄉鎮市分為數個不同的集群，本研究僅針對都會核心與工商市區兩集群進行抽樣，抽樣地區包含：

(1)台北市：松山區、信義區、大安區、中山區、中正區、大同區、萬華區、文山區、南港區、內湖區、士林區、北投區，共十二區。

(2)台中市：中區、南區、西區、北區、東區、西屯區、南屯區、北屯區、大里區，共九區。

(3)高雄市：鹽埕區、三民區、新興區、前金區、苓雅區、旗津區、鼓山區、左營區、前鎮區、鳳山區、鳥松區，共十一區。

2. 確認抽樣地區後接著蒐集各地區之所有街道名稱。台北市與高雄市的街道資料取得方式是從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以及高雄市民政局的網站下載。因台中市政府目前並無街道的整理資料檔案，其街道資料是透過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自行下載整理。台北市抽樣的十二區共 699 條街道、台中市抽樣的九區共 1717 條街道、高雄市抽樣的十一區共 1747 條街道。蒐集到各區之道路資料後再利用 EXCEL 整理刪除各區之間重複之道路後，再按照各城市各區原先的街道排序作編號，接將使用 EXCEL 的亂數功能重排，以隨機重新排序後之順序為依據來編號。確定選取的街道之後，再使用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所提供的「村里街路門牌查詢」，輸入欲抽樣之街道名稱，獲得此街道上的所有地址，再隨機選取所需數量之地址郵寄問卷。

3. 本研究共分成五次隨機以郵寄方式寄送問卷，寄送時間為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5 月。並於問卷上註明，當受試者收到問卷填寫完畢寄回，本研究在 4-6 週內會寄送 100 元全家禮券作為參與研究獎勵費。

(1) 首先向內政部戶政司申請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分區之人口統計資料，確認各區 20 歲以上人口數量，在第一次郵寄預計寄出 4000 份問卷，根據各城市所需數量，按照各城市 EXCEL 街道亂數表的排序，從第一條街道開始隨機抽取 50 個地址，每條街道在挑選前皆先使用 google map 街景系統稍作查詢，先行刪除太商業區的街道，或是戶政系統中搜尋不到地址的街道也先行刪除。因有些街道較短則不一定能選取到 50 筆地址，最終寄出 4,184 份問卷；台北市共選取了 42 條街道 1,974 筆地址、台中市共選取 23 條街道 1,036 筆地址、高雄市共選取 30 條街道 1,174 筆地址。寄出問卷中，郵局回覆為無效地址共有 347 筆。寄出問卷後，有針對回覆率較高的街道(回覆超過 8 筆)優先寄送提醒明信片，提醒該住戶我們曾寄送問卷敬請協助確認並填寫寄回，共寄出 1330 張明信片，因提醒明信片而收到的回覆為 51 份，最終回收 656 筆，回收中有 9 筆因回覆者年齡未達 20 歲為無效問卷。

(2) 因街道選取為按照各城市 EXCEL 街道亂數表的排序，在第一次郵寄時台中市的中區、南區、南屯區，以及高雄市的鳥松區、新興區，因亂數表的排列問題未挑選到這五個地區的街道寄送問卷。因此，第二次郵寄同樣按照 EXCEL 街道亂數表的排序，但先行往下挑選屬於這些地區中的街道寄送，每個地區各挑選一條街道隨機挑選 50 筆地址寄送問卷，共寄出 250 份問卷。寄出問卷中，郵局回覆為無效地址共有 6 筆。寄出問卷後，同樣針對回覆率較高(回覆超過 7 筆)的街道寄送提醒明信片，共寄出 79 張提醒明信片，因提醒明信片而收到的回覆為 0，最終回收 30 筆。

(3) 為更細緻分類出每個街道的特性，重新以 google map 檢驗隨機寄出的街道地址是否處於同一街道段落中，如可能一條街道分成一段二段三段，或是有不同的巷，重新檢驗已寄送的地址是否分屬不同的街道段落，根據回覆狀況將街道重新

做分類，並將較短的可寄送的地址過少的街道予以刪除。第三次郵寄即是針對這些重新分類出來的街道做寄送，最終寄出 1199 份問卷：台北市共針對 27 條街道，寄出 677 筆地址、台中市共針對 13 條街道，寄出 275 筆地址、高雄市共針對 8 條街，寄出 247 筆地址。寄出問卷中，郵局回覆為無效地址共有 30 筆。寄出問卷後，同樣有針對回覆率較高(回覆超過 7 筆)的街道寄送提醒明信片，共寄出 495 張提醒明信片，因提醒明信片而收到的回覆為 13 份問卷，最終回收 142 筆，回收中有 4 筆因回覆者年齡未達 20 歲為無效問卷

(4) 因以街道為單位的回覆狀況不佳，第四次郵寄問卷主要針對以分區為單位中未達 25 筆回覆的地區，分別是：台北市大安區、中山區、中正區、松山區、信義區、萬華區，台中市大里區、中區、北區、西區、東區、南屯區、南區，高雄市左營區、前金區、前鎮區、苓雅區、鳥松區、新興區、鼓山區、旗津區、鹽埕區。同樣根據 EXCEL 街道亂數表的順序，未達 25 筆回覆地區皆各挑選 2 條街道寄送問卷。因有些街道較短不一定能選取到 50 筆地址，最終寄出 2,000 份問卷；台北市共寄送 550 筆地址、台中市共寄送 597 筆地址、高雄市共寄送 853 筆地址。寄出問卷中，郵局回覆為無效地址共有 103 筆，最終回收 209 筆，回收中有 6 筆因回覆者年齡未達 20 歲為無效問卷。由於寄出問卷後，回覆較高的街道區域皆達到 25 筆，因此暫未寄出提醒明信片。

(5) 第五次郵寄問卷，再次針對以分區為單位中未達 25 筆回覆的地區，分別是：台北市萬華區、中山區、松山區，台中市西區、北區、南屯區、南區、中區，高雄市苓雅區、前金區、鳥松區、新興區、前金區。根據 EXCEL 街道亂數表順序，依照各區回覆數量多寡，再挑選 1-2 條街道寄送問卷。因有些街道較短不一定能選取到 50 筆地址，最終寄出 1,131 份問卷；台北市挑選了 4 條街道，共寄送 200 筆地址、台中市挑選了 10 條街道，共寄送 489 筆地址、高雄市挑選了 10 條街道，共寄送 442 筆地址。寄出問卷中，郵局回覆為無效地址共有 109 筆，最終回收 102 筆，回收中有 1 筆因回覆者年齡未達 20 歲為無效問卷。

最後總共寄出 8,764 份問卷，595 份問卷遭郵局退回找不到地址，最後回收

1,139 份問卷，其中因年齡未滿 20 歲，有 20 份問卷為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1,119 份，問卷回收率為 0.14 (見表 1)。一般來說，郵寄問卷的回收率為 20%-30%(周新富，民 98，頁 166)，然而本研究問卷回收率偏低，主要因素在於無法確定寄出問卷地址的正確性，以及無法確定郵局是否有確實退回錯誤地址的郵件，而影響到了整體問卷回收率的計算。

表 1.問卷回收率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總計
寄出問卷	4,184	250	1,199	2,000	1,131	8,764
郵局退回問卷	347	6	30	103	109	595
無效問卷	9	0	4	6	1	20
有效問卷 (寄出-無效-退回)	3,828	244	1,165	1,891	1,021	8,149
回收問卷	656	30	142	209	102	1,139
回收率 (回收/有效)	0.17	0.12	0.12	0.11	0.10	0.14

4.面訪部分

除了使用郵寄問卷之外，為更了解居民對於社區環境的看法，本研究也同時使用訪談方式，但受限於嘉義地理位置，依地緣關係，台中市為距離嘉義最近的城市，本研究最終僅針對台中市進行訪談。

面訪街道挑選方式同樣是按照 EXCEL 街道亂數表順序，接續在第一波的郵寄問卷後的順序挑選面訪街道，首先使用 google map 街景服務先刪除過於商業的街道後，一樣進入戶政系統查詢地址，總共預先挑選了 50 條街道進行實地的街道訪查，確認實際房屋、建築類型是否與 google map 所反應相同，以及規劃面訪路線，最後共選出 31 條街道作為實際面訪的道路，每條街道皆先使用戶政系統查詢系統隨機選出 20 個地址進行面訪。訪談員按照提供的地址逐一進行家

戶訪查，面訪時間是從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5 月，共完成 150 份問卷(見表 2)。

表 2. 各區訪談完成回收率

地區	街道數量	抽樣戶數	實際拜訪 ¹	完成 ²	拒絕 ³	其他 ⁴	完成率
西區	3	60	28	6	21	1	0.21
南區	3	60	41	16	23	2	0.39
北區	3	56	32	18	13	1	0.56
東區	3	45	21	6	11	4	0.29
中區	2	29	18	10	5	3	0.56
西屯區	5	100	39	20	16	3	0.51
北屯區	4	80	35	20	13	3	0.57
南屯區	2	40	21	12	6	3	0.57
大里區	6	120	74	42	29	3	0.57
總計	31	590	309	150	137	23	0.49

(四) 變項測量

1. 自變項：本研究自變項主要包含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區分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的主要差異在於，集體效能並非不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這關係的意義只是建立在為了達到共同的目標(goal)上，是較不穩定且非長期的關係。但社會連繫強調的便是「關係」本身的意義，除了認識之外彼此也是有互動，是包含感情上的連結。

(1) 社會連結，測量社會連結的變項主要是參考 Guest et al.(2006)研究，包含以下共十題問題，此變項信度為.827。題目類型包含連續變項與類別變項，將各題目以平均數做加總，總個數為 1,115，最大值為 4，最小值為 0.5，平均數為 2.02。

¹ 訪談員實際走訪全部抽樣的家戶，實際拜訪是指訪談員實際有接觸到的受訪者，扣除現場訪談時發現是公司、空屋、空號，以及無人回應的狀況。

² 實際拜訪的受訪者中同意受訪的人數。

³ 實際拜訪的受訪者中拒絕受訪的人數。

⁴ 其他因素是例如，訪員實際有碰到受訪者，但因訪談員無法配合於受試者指定時間回去受訪地點，或是訪談員前往當下為居住時間未滿三個月的情況。

連續變項問題，受試者非常同意為 4，非常不同意為 1。

- ①鄰居之間會關心注意彼此。
- ②鄰居之間通常不會講話聊天。(此題經過反向編碼)
- ③您平常會不會和鄰居聊天？
- ④您平常會不會去鄰居家作客或談天？
- ⑤在您所居住的街道，常不常見鄰居之間一起聊天、看書、吃飯、散步等？
- ⑥在您所居住的街道，常不常見大人陪小孩一起玩，或是教導孩子功課的情形？
- ⑦在您的鄰居之中，大概有多少人是彼此互相認識的？

以下為類別變項，以是或否(1、0)回答。

- ⑧是否有任何親近的親戚或好朋友與您住在同一條街道上？
- ⑨您是否能夠容易的分辨出誰是當地居民，或是陌生人？
- ⑩您知道鄰居的任何一人叫什麼名字嗎？

(2) 集體效能，測量集體效能的變項主要是參考主要參考 Moreonff et al.(2001)的研究，分為社會凝聚力與信任、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兩部分。由於整合此兩概念之題組信度未高於分開測量(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之題組信度為.748、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信度為.896，將兩概念整合之信度為.754)，因此本研究會分開討論此兩概念。

社會凝聚力與信任，包含以下六個問題，此變項信度為.748。題目類型包含連續變項與類別變項，將各題目以平均數做加總，總個數為 1,115，最大值為 3.5，最小值為 0，平均數為 2.45。

連續變項問題，受試者非常同意為 4，非常不同意為 1。

- ①鄰居之間會互相幫忙。
- ②整體來說，您相信您的鄰居。
- ③鄰居之間相處狀況不佳。(此題經過反向編碼)
- ④鄰居之間沒有共同的價值觀。(此題經過反向編碼)

以下為類別變項，以是或否(1、0)回答。

⑤您平常會不會和鄰居互相幫忙？

⑥您曾經向鄰居借過工具，或是會與鄰居互相分享食物？

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包含以下五個問題，此變項信度為.748。題目類型為連續變項，將各題目以平均數做加總，總個數為 1,108，最大值為 4，最小值為 0，平均數為 1.92。

如果在您居住的街道中發生以下描述的情況，您的鄰居協助處理可能性有多高？

非常可能為 4，非常不可能為 1。

①有小孩翹課，在您居住的街道上閒晃。

②有一群小孩在建築物上塗鴉。

③青少年對長輩表現出不禮貌的行為。

④在您家門口發生打架爭吵事件。

⑤有小孩刮傷或破壞路邊停放的車子/摩托車。

2. 依變項：居民的被害恐懼，以及對社區失序的知覺。

(1) 居民的被害恐懼，分成居民整體的被害恐懼、暴力犯罪被害恐懼，以及財產犯罪被害恐懼來討論。

整體被害恐懼，包含以下六個問題，此變項信度為.959。將各題目以平均數做加總，總個數為 1,108，最大值為 3，最小值為 0，平均數為 1.97。

根據以下犯罪行為，請問您會不會擔心在您居住的街道中有發生這樣的情況？以非常擔心(3 分)、有一點擔心(2 分)、完全不擔心(1 分)來回答。

①擔心有人闖入您家

②有人威脅要將您的錢或是財產搶走

③有人在您居住的街道攻擊您

④有人偷走您的車內財物

⑤有人破壞或損壞您的財務

⑥遭受性侵害

暴力犯罪被害恐懼，包含以下三個問題，此變項信度為.934。各題目以平均數做

加總，總個數為 1,091，最大值為 3，最小值為 1，平均數為 1.93。

①有人在您居住的街道攻擊您

②有人破壞或損壞您的財務

③遭受性侵害

財產犯罪被害恐懼，包含以下三個問題，此變項信度為.893。各題目以平均數做加總，總個數為 1,107，最大值為 3，最小值為 0，平均數為 2.01。

①擔心有人闖入您家

②有人威脅要將您的錢或是財產搶走

③有人偷走您的車內財物

(2) 居民對社區失序的知覺，分成社會失序、物理失序，以及兩者相加之整體社區失序狀況來討論。

社會失序，包含以下八個問題，此變項信度為.601。各題目以平均數做加總，總個數為 1,065，最大值為 4，最小值為 1，平均數為 1.24。

在過去一年中，您認為以下所描述的活動多長在您居住的街道中發生？每天發生(4 分)、一個禮拜幾次(3 分)、一個月幾次(2 分)、一個月內都沒發生(1 分)來回答。

①有人在您居住的街道區域上打架爭吵

②成群的孩子一起閒晃

③有人公眾飲酒

④有人在您居住的街道喝醉酒

⑤有乞丐在乞討

⑥有人在晚上製造噪音

⑦有人在外面賣藥物毒品

⑧有性工作者在街上拉客

物理失序，包含以下七個問題，此變項信度為.755。各題目以平均數做加總，總個數為 1,104，最大值為 2.6，最小值為 1，平均數為 1.22。

根據以下對於您居住交到外觀的描述，請問您所居住的街道是否有這樣的情況？

請您以沒有(1分)、一些(2分)、很多(3分)來回答。

- ①有窗戶破掉的建築物
- ②牆上有塗鴉
- ③很多廢棄的空屋
- ④廢棄或是被用木板堵上的建築物
- ⑤廢棄的車輛
- ⑥路上有垃圾以及破碎玻璃
- ⑦沒有足夠的燈光照明設備

整體失序，為將社會失序與整體失序的各題目以平均數做加總，此題組變項信度為.783，總個數為 1,111，最大值為 2.58，最小值為 1，平均數為 1.22。

3. 控制變項

根據社會解組理論，鄰里地區的經濟狀況、人口移動率與異質性皆會影響到此地區的社會控制力，而影響到犯罪與偏差行為的發生。因此，當地居民的性別、居住時間、擁有自己的房子、經濟能力與教育程度，都能夠幫助我們更瞭解此鄰里地區的環境結構狀態。另外，其他可以幫助瞭解此地區人口結構特性的變項，還包含了像是居民的年齡、婚姻狀態等。Hipp (2010)的研究提到，個人的年齡、婚姻狀態，都是影響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的產生以及減少互動的因素(p.149)。因此，也能夠藉由此部份的討論，來瞭解此地區的同質性，代表如果居民之間的彼此生活經驗愈相近，彼此的互動也會較密切，鄰里地區的社會控制力可能也會更好。由於本研究主要要探討當地居民的被害恐懼感，以及對社區環境失序知覺，也加入被害經驗做為控制變項來討論。

(1) 居住時間長短：受試者在目前居住地址住了多久。以分組方式重新編碼，0.02-0.11 為 1(兩個月到十一個月，一年以下)、1-5.11 為 2(六年以下)、6-10.11 為 3(六年到十一年以下)...到 76-80.11(七十六年到八十一年間)為 17。

(2) 教育程度：受試者完成的最高學歷。

(3) 婚姻狀態：受試者目前的婚姻狀態為結婚/同居、單身、離婚/分居、守寡。

進行重新編碼，分為 1 為結婚/同居，0 為其他。

(4) 有自己的房子：受試者現在所居住的為自己所擁有的房子、父母的、親戚朋友的、租的、宿舍。進行重新編碼方式 1 為自己的，0 為其他。

(5) 收入：受試者全家一個月所有收入。

(6) 年齡：受試者的年齡，以分組別方式重新編碼，為符合倫理需求，年齡為從 20 歲起算，20-29 為 1、30-39 為 2...到 90-99 為 8。

(7) 性別：受試者的性別為男或女，編碼方式 1 為男生，0 為女生。

(8) 被害經驗：包含以下四個問題，此變項信度為.540。各題目以平均值做加總，總個數為 1,106，最大值為 1，最小值為 0，平均數為.03。

①您是否曾經因犯罪事件發生而被害

②是否有任何人闖入您家

③是否遭受暴力攻擊?例如:打架、搶劫。或是肢體上的攻擊

④是否有人在您家的陽台、庭院、車庫，或是除了家裡以外的其他地方偷東西

(五) 樣本特性

根據以上所討論的變項測量，首先將針對郵寄問卷部分個人背景變項做樣本特性描述如下。整體來看，此研究樣本的居民年齡以 50-59 歲的人口數最多，共 276 人(24.7%)(見表 3-1)，主要人口組成以中壯年為主。性別則是以女性為主，共 580 人(51.8%)，但男性也有 524(46.8%)，可見性別懸殊比不大(見表 3-2)。居住時間則大多介於一年以上六年以下，共 247 人(22.1%)(見表 3-3)。居民的婚姻狀態是以已婚/同居占多數，共 788 人 (70.4%)(見表 3-4)。教育程度，以大學畢業人口占多數，共 582 居民 (52.0%)為大學畢業(見表 3-5)。經濟狀況部份，家庭每月總收入大部分介於 50,000-80,000 元 (25.7%)(見表 3-6)，大部分的人也表示是居住在自己的房子共 707 人(63.2%)，而非是承租或是其他住在宿舍等情況(見表 3-7)。在被害經驗部分，976 人(87.2%)皆表示沒有過任何被害經驗(見表 3-8)。

在面訪部分，此居民年齡以60-69歲的人口數最多，共36人(24%)(見表4-1)，

主要人口組成以老年為主。性別則是以女性為主，共95人(63.3%)(見表4-2)。居住時間則大多介於6年到10年之間，共27人(18%)(見表4-3)。居民的婚姻狀態是以已婚/同居占多數，共107人 (71%)(見表4-4)。教育程度，以大學畢業人口占多數，共54居民 (36%)為大學畢業(見表4-5)。經濟狀況部份，家庭每月總收入大部分為3萬到5萬 (16%)(見表4-6)，大部分的人也表示是居住在自己的房子共113人(75.3%)，而非是承租或是其他住在宿舍等情況(見表4-7)。在被害經驗部分，132人(88%)皆表示沒有過任何被害經驗(見表4-8)。

表3-1 年齡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20-29	111	9.9	10.2
30-39	193	17.2	17.7
40-49	247	22.1	22.7
50-59	276	24.7	25.4
60-69	190	17.0	17.5
70-79	47	4.2	4.3
80-89	17	1.5	1.6
90-99	7	.6	.6
總和	1088	97.2	100.0
遺漏值 missing	31	2.8	
總和	1119	100.0	

表 3-2 性別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女	580	51.8	52.5
男	524	46.8	47.5
總和	1104	98.7	100.0
遺漏值	15	1.3	
總和	1119	100.0	

表 3-3 居住時間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0.02-0.11	37	3.3	3.5

	1-5.11	247	22.1	23.5
	6-10.11	175	15.6	16.7
	11-15.11	141	12.6	13.4
	16-20.11	130	11.6	12.4
	21-25.11	79	7.1	7.5
	26-30.11	90	8.0	8.6
	31-35.11	65	5.8	6.2
	36-40.11	50	4.5	4.8
	41-45.11	14	1.3	1.3
	46-50.11	13	1.2	1.2
	51-55.11	4	.4	.4
	56-60.11	3	.3	.3
	61-65.11	1	.1	.1
	66-70.11	1	.1	.1
	71-75.11	1	.1	.1
	總和	1051	93.9	100.0
遺漏值	不知道	38	3.4	
	missing	30	2.7	
	總和	68	6.1	
總和		1119	100.0	

表 3-4 婚姻狀態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其他	318	28.4	28.8
已婚	788	70.4	71.2
總和	1106	98.8	100.0
遺漏值	13	1.2	
總和	1119	100.0	

表 3-5 教育程度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未受正規教育	2	.2	.2
小學	26	2.3	2.4
國中	48	4.3	4.3
高中職	270	24.1	24.4
大學	582	52.0	52.6
碩士	155	13.9	14.0

博士	23	2.1	2.1
總和	1106	98.8	100.0
遺漏值	13	1.2	
總和	1119	100.0	

表3-6 家庭每月總收入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沒有收入	27	2.4	2.9
10869	9	.8	1.0
11000-18000	40	3.6	4.3
18000-30000	87	7.8	9.4
30000-50000	192	17.2	20.7
50000-80000	238	21.3	25.7
80000-130000	189	16.9	20.4
130000	145	13.0	15.6
總和	927	82.8	100.0
不知道	160	14.3	
遺漏值 missing	32	2.9	
總和	192	17.2	
總和	1119	100.0	

表3-7 有自己的房子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其他	394	35.2	35.8
有自己的房子	707	63.2	64.2
總和	1101	98.4	100.0
不知道	2	.2	
遺漏值 missing	16	1.4	
總和	18	1.6	
總和	1119	100.0	

表3-8 被害經驗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0	976	87.2	91.4
1	69	6.2	6.5
2	15	1.3	1.4
3	6	.5	.6

	4	2	.2	.2
	總和	1068	95.4	100.0
遺漏值	系統界定的 遺漏	51	4.6	
總和		1119	100.0	

表4-1 面訪年齡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20-29	12	8.0	8.1
30-39	21	14.0	14.1
40-49	26	17.3	17.4
50-59	31	20.7	20.8
60-69	36	24.0	24.2
70-79	17	11.3	11.4
80-89	6	4.0	4.0
總和	149	99.3	100.0
遺漏值	訪員跳問	1	.7
總和		150	100.0

表 4-2 面訪性別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女	95	63.3	63.8
男	54	36.0	36.2
總和	149	99.3	100.0
遺漏值	訪員跳問	1	.7
總和		150	100.0

表 4-3 面訪居住時間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0.02-0.11	2	1.3	1.3
1-5.11	16	10.7	10.7
6-10.11	27	18.0	18.1
11-15.11	20	13.3	13.4
16-20.11	21	14.0	14.1
21-25.11	14	9.3	9.4
26-30.11	20	13.3	13.4

	31-35.11	7	4.7	4.7
	36-40.11	12	8.0	8.1
	41-45.11	4	2.7	2.7
	46-50.11	4	2.7	2.7
	51-55.11	1	.7	.7
	61-65.11	1	.7	.7
	總和	149	99.3	100.0
遺漏值	訪員跳問	1	.7	
總和		150	100.0	

表 4-4 面訪婚姻狀態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其他	41	27.3	27.7
已婚	107	71.3	72.3
總和	148	98.7	100.0
遺漏值	拒絕回答	1	.7
	訪員跳問	1	.7
	總和	2	1.3
總和	150	100.0	

表 4-5 面訪教育程度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未受正規教育	6	4.0	4.0
小學	23	15.3	15.3
國中	15	10.0	10.0
高中職	46	30.7	30.7
大學	54	36.0	36.0
碩士	5	3.3	3.3
博士	1	.7	.7
總和	150	100.0	

表4-6 面訪家庭每月總收入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沒有收入	10	6.7	12.5
10869	1	.7	1.3
11000-18000	5	3.3	6.3

	18000-30000	16	10.7	20.0
	30000-50000	24	16.0	30.0
	50000-80000	12	8.0	15.0
	80000-130000	12	8.0	15.0
	總和	80	53.3	100.0
遺漏值	拒絕回答	80	53.3	100.0
	不知道	40	26.7	
	訪員跳問	28	18.7	
	總和	2	1.3	
總和		150	70	

表4-7 面訪有自己的房子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其他	37	24.7	24.7
有自己的房子	113	75.3	75.3
總和	150	100.0	

表4-8 被害經驗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0	132	88.0	88.0
1	9	6.0	6.0
2	8	5.3	5.3
3	1	0.7	0.7
總和	150	100.0	

(六) 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迴歸分析。迴歸分析指的是以自變項去預測依變項的過程，最大的優點在於依最小平方法估計出方程式後，可藉由統計檢定評估所選擇的自變項是否適當，以及所建立之方程式是否能描述依變項與自變項間之關係。因此，在本研究中為瞭解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是否會影響到居民的被害恐懼，以及對社區環境的失序知覺，本研究使用複迴歸程序(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運用變項之間的關聯進行解釋與預測，來測量社區的結構因素、集體效能與社會連結對於居民的被害恐懼，以及對社區環境的失序知覺的影響。

四、研究結果

雖然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為本研究主要的自變項，然而，為了解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對社區的重要性，本研究首先將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作為依變項，並以社區中個人控制變項作為自變項，檢視那些社區中的居民人口結構會影響到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

(一) 預測社會連結

首先使用多元迴歸分析，檢視社區的結構因素對於社會連結的影響。以居民社會連結做為依變項，以居民的居住時間、教育程度、收入、性別、婚姻狀況、有自己的房子、年紀，同時加入集體效能(分為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以及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兩部分)，作為自變項，在郵寄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5-1)，居民的居住時間越長、有自己的房子、社會凝聚力與信任愈高，社會連結也越高。反之，教育程度越高，社會連結越低。整體來說，居民的社會連結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55.7% 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居住時間、教育程度、有自己的房子、社會凝聚力與信任，這四個變項所解釋。

面訪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5-2)，居民為已婚或處於同居狀態，以及社會凝聚力與信任愈高，社會連結也越高。反之，收入越高，社會連結越低。整體來說，居民的社會連結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70.7% 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收入、婚姻狀況、社會凝聚力與信任，這三個變項所解釋。

表 5-1 預測郵寄部分的社會連結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370	.095	3.892	.000***
居住時間	.009	.004	2.329	.020*
教育程度	-.025	.012	-2.102	.036*
收入	-.003	.007	-.432	.666
性別	.034	.020	1.712	.087
婚姻狀況	.016	.025	.650	.516
自己的房子	.062	.025	2.507	.012*

年紀	-.016	.009	-1.804	.072
凝聚力	.681	.022	30.402	.000***
共同期待	.023	.014	1.577	.115
R ²	.557			

表 5-2 預測面訪部分社會連結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302	.272	1.109	.271
居住時間	.021	.011	1.890	.063
教育程度	-.007	.028	-.249	.804
收入	-.031	.014	-2.166	.034*
性別	-.099	.050	-1.989	.051
婚姻狀況	.125	.055	2.285	.025*
自己的房子	-.042	.065	-.643	.522
年紀	-.014	.022	-.637	.526
凝聚力	.702	.070	10.055	.000***
共同期待	.065	.089	.733	.466
R ²	.707			

(二) 預測集體效能

將集體效能分為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以及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兩個部分來討論。

1. 預測社會凝聚力與信任

使用多元迴歸分析，檢視社區的結構因素對於集體效能的影響。以居民的社會凝聚力與信任做為依變項，以居民的居住時間、教育程度、收入、性別、婚姻狀況、有自己的房子、年紀、社會連結、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作為自變項，在郵寄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6-1)，居民為男性，居民的社會凝聚力與信任會越低。反之，居民的年紀越大、社會連結越高，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也越高。整體來說，居民的社會凝聚力與信任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55% 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居民的性別、年紀、社會連結所解釋。

面訪部分結果則顯示(見表 6-2)，僅有社會連結能夠顯著正向的預測社會凝

聚力與信任，即居民的社會連結越高，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也越高。整體來說，居民的社會凝聚力與信任的總體變量中，有 67.3% 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居民的社會連結所解釋。

表 6-1 預測郵寄部分社會凝聚力與信任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782	.099	7.922	.000***
居住時間	.000	.004	-.052	.959
教育程度	.009	.013	.679	.497
收入	.001	.007	.175	.861
性別	-.043	.022	-1.998	.046*
婚姻狀況	.029	.026	1.096	.273
自己的房子	-.021	.027	-.791	.429
年紀	.022	.009	2.412	.016*
社會連結	.778	.026	30.402	.000***
共同期待	-.001	.015	-.047	.963
R ²	.550			

表 6-2 預測面訪部分社會凝聚力與信任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267	.299	.894	.374
居住時間	-.008	.012	-.632	.529
教育程度	.006	.031	.195	.846
收入	.018	.016	1.102	.274
性別	.087	.055	1.585	.117
婚姻狀況	-.020	.062	-.325	.746
自己的房子	.027	.071	.371	.712
年紀	.010	.024	.405	.686
社會連結	.841	.084	10.055	.000***
共同期待	.097	.097	.999	.321
R ²	.673			

2. 預測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

在預測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郵寄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6-3)，僅有收入能夠正向顯著預測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也就是說居民的收入越高，對社會控制

的共同期待也會越高。整體來說，居民的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2.9% 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收入所解釋。

面訪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6-4)，僅有教育程度能夠正向顯著預測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也就是說居民的教育程度越高，對社會控制的共同期待也會越高。整體來說，居民的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19.4% 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教育程度所解釋。

表 6-3 預測郵寄部分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2.104	.219	9.618	.000***
居住時間	-.008	.010	-.834	.405
教育程度	.007	.029	.252	.801
收入	.043	.016	2.717	.007**
性別	.047	.049	.960	.337
婚姻狀況	-.088	.059	-1.478	.140
自己的房子	-.089	.060	-1.481	.139
年紀	-.020	.021	-.980	.327
社會連結	.132	.084	1.577	.115
凝聚力	-.004	.079	-.047	.963
R ²	.029			

表 6-4 預測面訪部分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1.806	.299	6.042	.000
居住時間	.005	.015	.356	.723
教育程度	.074	.036	2.029	.046*
收入	.020	.020	1.031	.306
性別	.030	.068	.445	.658
婚姻狀況	-.056	.076	-.743	.460
自己的房子	.013	.088	.145	.885
年紀	.009	.029	.314	.755
社會連結	.117	.160	.733	.466
凝聚力	.146	.146	.999	.321
R ²	.194			

(三) 預測被害恐懼

1. 預測整體被害恐懼

使用多元迴歸分析，檢視社區的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對於居民被害恐懼的影響。以居民被害恐懼做為依變項，以居民的居住時間、教育程度、收入、性別、婚姻狀況、有自己的房子、年紀、集體效能(分為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以及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兩部分)、社會連結、被害經驗，以及知覺到的環境整體失序狀況作為自變項，郵寄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7-1)，居民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整體被害恐懼越低；婚姻狀況越穩定為已婚或同居者，以及知覺到的環境整體失序狀況越嚴重，整體被害恐懼越高。整體來說，居民的整體被害恐懼感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6.6%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教育程度、收入、婚姻狀況，以及知覺到的環境整體失序這四個變項所解釋。

面訪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7-2)，居民有自己的房子，以及知覺到的環境整體失序狀況越嚴重，整體被害恐懼也會越高。整體來說，居民整體被害恐懼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28.1%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有自己的房子，以及知覺到的環境整體失序所解釋。

表 7-1 預測郵寄部分的整體被害恐懼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1.735	.303	5.723	.000***
居住時間	.005	.010	.529	.597
教育程度	-.063	.031	-2.015	.044*
收入	-.034	.017	-2.000	.046*
性別	-.073	.052	-1.393	.164
婚姻狀況	.163	.064	2.544	.011*
自己的房子	-.034	.065	-.516	.606
年紀	.031	.022	1.382	.167
社會連結	-.010	.090	-.106	.916
凝聚力	-.043	.086	-.494	.621
共同期待	.030	.038	.787	.431
被害經驗	.117	.236	.498	.619
整體失序	.480	.102	4.693	.000***

R ²	.066
----------------	------

表 7-2 預測面訪部分的整體被害恐懼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1.882	.802	2.348	.022*
居住時間	.011	.026	.414	.680
教育程度	.075	.066	1.135	.260
收入	-.055	.033	-1.651	.103
性別	-.132	.116	-1.134	.261
婚姻狀況	-.194	.129	-1.513	.135
自己的房子	.401	.149	2.701	.009**
年紀	-.077	.051	-1.524	.132
社會連結	.301	.271	1.110	.271
凝聚力	-.198	.247	-.802	.425
共同期待	-.137	.225	-.608	.545
被害經驗	.543	.392	1.385	.171
整體失序	.692	.323	2.140	.036*
R ²	.281			

2. 預測暴力犯罪被害恐懼

在預測暴力犯罪被害恐懼，郵寄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7-3)，居民婚姻狀況越穩定為已婚或同居者，以及知覺到的環境整體失序狀況越嚴重，暴力犯罪被害恐懼越高。整體來說，居民的暴力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5.5%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婚姻狀況，以及知覺到的環境整體失序這兩個變項所解釋。

面訪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7-4)，居民有自己的房子，以及知覺到的環境整體失序狀況越嚴重，暴力犯罪被害恐懼也會越高。整體來說，居民暴力犯罪被害恐懼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29.9%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有自己的房子，以及知覺到的環境整體失序所解釋。

表 7-3 預測郵寄部分的暴力犯罪被害恐懼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1.573	.322	4.885	.000***
居住時間	.003	.011	.238	.812

教育程度	-.041	.033	-1.249	.212
收入	-.026	.018	-1.434	.152
性別	-.101	.055	-1.827	.068
婚姻狀況	.172	.068	2.544	.011*
自己的房子	-.044	.069	-.643	.521
年紀	.031	.024	1.295	.196
社會連結	.001	.096	.011	.991
凝聚力	-.051	.092	-.561	.575
共同期待	.010	.040	.246	.806
被害經驗	-.017	.253	-.066	.948
整體失序	.519	.109	4.767	.000***
R ²	.055			

表 7-4 預測面訪部分的暴力犯罪被害恐懼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2.056	.841	2.443	.017*
居住時間	.010	.027	.376	.708
教育程度	.058	.069	.839	.405
收入	-.069	.035	-1.972	.053
性別	-.170	.122	-1.392	.169
婚姻狀況	-.212	.135	-1.572	.121
自己的房子	.477	.156	3.057	.003**
年紀	-.091	.053	-1.711	.092
社會連結	.331	.284	1.164	.248
凝聚力	-.193	.260	-.744	.459
共同期待	-.220	.236	-.930	.356
被害經驗	.339	.411	.824	.413
整體失序	.787	.340	2.317	.024**
R ²	.299			

3. 預測財產犯罪被害恐懼

在預測財產犯罪被害恐懼，郵寄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7-5)，居民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財產被害恐懼越低；婚姻狀況越穩定為已婚或同居者，以及知覺到的環境整體失序狀況越嚴重，財產犯罪被害恐懼越高。整體來說，居民的整體財產犯罪恐懼感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7.5%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教育程度、

收入、婚姻狀況，以及知覺到的環境整體失序這四個變項所解釋。

面訪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7-4)，僅有居民有自己的房子，能夠顯著正向預測財產犯罪被害恐懼，也就是說居民有自己的房子，財產犯罪被害恐懼也會越高。整體來說，居民財產犯罪被害恐懼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23.9%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有自己的房子所解釋。

表 7-5 預測郵寄部分的財產犯罪被害恐懼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1.841	.304	6.063	.000***
居住時間	.007	.010	.707	.480
教育程度	-.078	.031	-2.503	.012*
收入	-.041	.017	-2.382	.017*
性別	-.043	.052	-.814	.416
婚姻狀況	.155	.064	2.422	.016*
自己的房子	-.030	.065	-.454	.650
年紀	.041	.022	1.844	.066
社會連結	-.013	.090	-.147	.883
凝聚力	-.040	.086	-.463	.644
共同期待	.041	.038	1.085	.278
被害經驗	.197	.236	.837	.403
整體失序	.457	.102	4.460	.000***
R ²	.075			

表 7-6 預測面訪部分的財產犯罪被害恐懼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1.683	.849	1.983	.052
居住時間	.012	.027	.447	.656
教育程度	.090	.070	1.292	.201
收入	-.040	.035	-1.142	.257
性別	-.088	.123	-.719	.474
婚姻狀況	-.172	.136	-1.265	.210
自己的房子	.324	.157	2.061	.043*
年紀	-.062	.054	-1.164	.248
社會連結	.292	.287	1.020	.311
凝聚力	-.226	.262	-.863	.391

共同期待	-.055	.238	-.231	.818
被害經驗	.728	.415	1.755	.084
整體失序	.627	.342	1.829	.072
R ²	.239			

(二) 預測知覺到的環境失序

1. 預測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

使用多元迴歸分析，檢視社區的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對於居民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的影響。以居民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做為依變項，以居民的居住時間、教育程度、收入、性別、婚姻狀況、有自己的房子、年紀、集體效能(分為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以及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兩部分)、社會連結、被害經驗，以及被害恐懼狀況作為自變項，郵寄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8-1)，居民的收入越高、年紀越大、社會凝聚力與信任越高，會認為整體環境的失序狀況較低；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越高、整體被害恐懼越高、整體被害經驗越多，會認為整體環境的失序狀況較高。整體來說，居民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16% 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收入、年紀、社會凝聚力與信任、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居民的被害經驗，以及居民的整體被害恐懼這些變項所解釋。

面訪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8-2)，居民的教育程度越高，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越低。反之，居民的整體被害恐懼越高、整體被害經驗越多，會認為整體環境的失序狀況較高。整體來說，居民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26.3% 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教育程度、居民的被害經驗，以及居民的整體被害恐懼所解釋。

表 8-1 預測郵寄部分居民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1.547	.090	17.282	.000***
居住時間	.002	.003	.509	.611
教育程度	-.012	.011	-1.117	.264
收入	-.018	.006	-3.098	.002**
性別	-.003	.018	-.143	.887

婚姻狀況	-.027	.022	-1.259	.208
自己的房子	-.003	.022	-.134	.894
年紀	-.017	.008	-2.304	.021*
社會連結	-.011	.031	-.363	.717
凝聚力	-.111	.029	-3.852	.000***
共同期待	.031	.013	2.452	.014*
被害經驗	.469	.078	6.007	.000***
整體被害恐懼	.055	.012	4.693	.000***
R ²	.160			

表 8-2 預測面訪部分居民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1.061	.276	3.846	.000***
居住時間	-.006	.009	-.615	.541
教育程度	-.055	.023	-2.364	.021*
收入	.007	.012	.586	.560
性別	.049	.042	1.155	.252
婚姻狀況	.022	.048	.467	.642
自己的房子	-.053	.057	-.940	.351
年紀	-.030	.018	-1.602	.114
社會連結	-.037	.100	-.375	.709
凝聚力	-.013	.091	-.144	.886
共同期待	.098	.082	1.205	.232
被害經驗	.291	.141	2.065	.043*
整體被害恐懼	.092	.043	2.140	.036*
R ²	.263			

2. 預測知覺到的社會失序

在預測居民知覺到的社會失序，郵寄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8-3)，居居民的收入越高、年紀越大、社會凝聚力與信任越高，知覺到的社會失序狀況較低；反之，居民對社會控制的共同期待越高、整體被害恐懼越高、被害經驗越多，知覺到的社會失序狀況較高。整體來說，居民知覺到的社會失序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12.9% 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收入、年紀、社會凝聚力與信任、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居民的被害經驗，以及居民的整體被害恐懼這些變項所解釋。

面訪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8-4)，僅有居民的整體被害恐懼，能夠顯著正向預測居民知覺到的社會失序，也就是說居民的整體被害恐懼越高，居民知覺到的社會失序也會越高。整體來說，居民知覺到的社會失序中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18.4% 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整體被害恐懼所解釋。

表 8-3 預測郵寄部分居民知覺到的社會失序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1.584	.138	11.485	.000***
居住時間	.008	.005	1.474	.141
教育程度	-.004	.016	-.251	.802
收入	-.028	.009	-3.196	.001**
性別	-.037	.027	-1.353	.176
婚姻狀況	-.038	.034	-1.139	.255
自己的房子	.020	.034	.589	.556
年紀	-.036	.012	-3.084	.002**
社會連結	.037	.047	.781	.435
凝聚力	-.171	.045	-3.825	.000***
共同期待	.046	.020	2.353	.019*
被害經驗	.470	.119	3.939	.000***
整體被害恐懼	.085	.018	4.665	.000***
R ²	.129			

表 8-4 預測面訪部分居民知覺到的社會失序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819	.286	2.867	.006**
居住時間	.003	.010	.334	.740
教育程度	-.026	.024	-1.069	.289
收入	.007	.013	.540	.591
性別	.012	.044	.281	.780
婚姻狀況	.039	.049	.784	.436
自己的房子	-.063	.059	-1.079	.285
年紀	-.011	.019	-.593	.555
社會連結	-.058	.103	-.558	.579
凝聚力	-.068	.094	-.725	.471
共同期待	.138	.085	1.629	.108
被害經驗	-.013	.146	-.092	.927

整體被害恐懼	.120	.045	2.677	.009**
R ²	.184			

3. 預測知覺到的物理失序

在預測居民知覺到的物理失序，郵寄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8-5)，居居民的社會凝聚力與信任越高，知覺到的物理失序狀況較低；整體被害恐懼越高、整體被害經驗越多，知覺到的物理失序狀況較高。整體來說，居民知覺到的物理失序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11%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社會凝聚力與信任、居民的被害經驗，以及居民的整體被害恐懼這些變項所解釋。

面訪部分結果顯示(見表 8-6)，居民的教育程度越高，知覺到的物理失序越低。反之，居民的整體被害經驗越多，知覺到的物理環境的失序狀況較高。整體來說，居民知覺到的物理失序的總體變異量中，有 26.3%的變異量可以被模型中的教育程度、居民的被害經驗所解釋。

表 8-5 預測郵寄部分居民知覺到的物理失序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1.500	.099	15.161	.000***
居住時間	-.004	.004	-1.092	.275
教育程度	-.011	.012	-.973	.331
收入	-.008	.006	-1.245	.213
性別	.004	.020	.194	.846
婚姻狀況	-.038	.024	-1.580	.114
自己的房子	-.028	.024	-1.148	.251
年紀	-.002	.008	-.195	.845
社會連結	-.042	.034	-1.242	.214
凝聚力	-.073	.032	-2.291	.022*
共同期待	.018	.014	1.285	.199
被害經驗	.490	.088	5.572	.000***
整體被害恐懼	.049	.013	3.740	.000***
R ²	.110			

表 8-6 預測面訪部分居民知覺到的物理失序

變項	相關	標準誤差	t 值	顯著性
截距	1.307	.458	2.856	.006**
居住時間	-.016	.015	-1.047	.299
教育程度	-.091	.039	-2.360	.021*
收入	.006	.020	.314	.755
性別	.094	.070	1.332	.187
婚姻狀況	.005	.079	.065	.949
自己的房子	-.040	.094	-.426	.672
年紀	-.053	.031	-1.723	.090
社會連結	-.013	.165	-.081	.936
凝聚力	.045	.151	.298	.767
共同期待	.071	.135	.525	.601
被害經驗	.681	.234	2.914	.005***
整體被害恐懼	.066	.072	.926	.358
R ²	.263			

五、討論與結論

首先從被害恐懼的結果來看，在個人因素部分，郵寄與面訪的結果差異很大。從郵寄問卷的結果來看，個人的教育程度、收入，以及婚姻狀態對於個人的整體被害恐懼感影響很大。然而，面訪部分的結果顯示僅有居民有自己的房子此變項對個人的整體被害恐懼感有影響。以不同的犯罪類型來看，郵寄與面訪的結果差異仍是很大⁵。

比較郵寄問卷與面訪問卷的樣本特性，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地區、性別、年齡、居住時間，以及收入。郵寄問卷的地區包含了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面訪是僅包含台中市。然而，本研究另外比較郵寄問卷僅有台中市的結果，與面訪結果做比較，結果在個人因素部分結果仍是不同-個人的婚姻狀態能顯著預測整體被害恐懼、暴力犯罪被害恐懼，以及財產犯罪被害。此外，若從社區因素部分來看，郵寄與面訪結果皆顯示，居民知覺到的環境失序狀況越嚴重，他們的整體犯罪被害恐懼感也會越高。居民知覺到的環境失序也皆能夠顯著預測暴力犯罪被害恐懼感，以及財產犯罪被害恐懼感。顯見，郵寄與面訪結果的差異並非因地區因素造成。

與面訪相比，郵寄部分的男女比例懸殊較低、年齡較低、居住時間較短、收入較低，然而，這些變項不論是在郵寄或是面訪部分結果皆無顯著，我們無法從樣本特性來討論郵寄與面訪結果的差異性。因此，最有可能的解釋因素在於，郵寄與面訪兩種不同的測量方式對結果本身造成影響。雖然兩者皆是採用隨機抽樣，但在郵寄部分我們無法完全確定填答者的身分及填答的正確性，因而可能造成兩者研究上的差異，尤其若從決定係數(R^2)來看，面訪結果的決定係數皆高於郵寄結果，顯見面訪結果的預測效果與解釋力皆比郵寄結果好。

此外，就被害恐懼部分，有幾個較特別的發現。第一，本研究中，不論郵寄或是面訪部分的性別變項皆無顯著，然而，根據以往研究來看，性別是影響犯罪

⁵ 郵寄問卷部分：個人婚姻狀態能夠顯著預測暴力犯罪被害恐懼；個人的教育程度、收入、婚姻狀態能夠顯著預測財產犯罪被害恐懼。面訪部分：有自己的房子能夠顯著預測暴力犯罪與財產犯罪被害恐懼。

被害恐懼感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女性的被害恐懼感會高於男性(李素馨，民89；陳淑娟、董旭英，民95)。本研究會有這樣不同的差異，可能原因在於，研究樣本來看，郵寄與面訪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皆沒有過任何被害經驗者，分別占了87.2%與92%。因此在這麼低的被害經驗下可能造成居民的被害恐懼感相對偏低。同時，也可能因為較低的被害經驗，本研究中被害經驗對於被害恐懼感也是沒有顯著影響的。第二，面訪部分結果發現，居民有自己的房子，整體的被害恐懼、暴力犯罪被害恐懼，以及財產犯罪被害恐懼也都會越高。但根據Adams及Serpe (2000)的研究是發現有自己的房子，對被害恐懼感沒有影響。然而，根據Brown、Perkins及Brown (2003) 的研究提到的，有自己的房子(home ownership)比起租房者，他們居住的時間會比較長、對房子的投資會較多、比較會認識他們的鄰居、較會參加社區的組織，但同時，他們也比較不會離開較貧困的社區(p.260)。也就是說，本研究會有這樣的結果的可能原因在於，因為有自己的房子，縱使居住在這個社區他們感覺到的被害恐懼感高，但因為對於居住環境的熟悉程度與投資因素而不會離開目前居住的社區，造成有自己的房子此一變項是正向顯著預測居民被害恐懼的結果。第三，無論是在郵寄或是面訪結果，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皆無法顯著預測居民的被害恐懼，然而，以往在西方國家的研究是發現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能夠負向顯著預測被害恐懼(Gibson et al., 2002)，Abdullah等人(2015)在馬來西亞的研究也是發現集體效能越高，被害恐懼則會越低。然而根據陳淑娟及董旭英(民95)，以及Weng(2007)在台灣的研究分別是發現社區整合(指的是包含社區居民的互動、是否組成社區自衛隊、對社區的滿意度，以及社區共識的達成等)，與集體效能越高，被害恐懼也會越高。可見有關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的研究仍需再進一步驗證與討論。

在預測居民知覺到的環境失序，同樣在個人因素部分郵寄與面訪的結果是有所差異的⁶。此外，就居民知覺到的環境失序部分的主要發現是，在郵寄問卷結

⁶ 郵寄問卷部分：個人的收入、年紀能夠顯著預測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社會失序。面訪部分：個人的教育程度能夠顯著預測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物理失序。

果部分，集體效能能夠顯著預測居民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社會失序以及物理失序，此一結果是與過往研究發現一致的(Sampson & Raudenbush, 1999; Abdullah et al. 2015)。本研究是將集體效能分為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以及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兩部分來看，雖然兩者能顯著預測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與社會失序，但結果是顯示個人的社會凝聚力與信任越高，知覺到的整體環境失序、社會失序，以及物理失序越低；對社會控制的共同期待越高，知覺到的環境失序、社會也會越高，在物理失序部分則沒有顯著。也就是說，在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部分的結果與以往研究是剛好相反的。會有這樣的研究結果可能是由於居民對環境失序的知覺較高，故對社會控制的共同期待同等也會較高，期待能夠解決社區中失序的問題；又或是說，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的表示居民更願意參與公共事務，以及關心他們的社區，以致於他們可能更容易知覺到環境的失序，造成對社會控制的共同期待越高，知覺到的環境失序也越高。然而，在面訪部分，無論是社會連結或是集體效能皆無法顯著預測個人知覺到的環境失序。

根據以上討論可以知道，社會連結對於個人的被害恐懼以及知覺到的環境失序皆影響，而集體效能中的社會凝聚力與信任能夠正向顯著的預測個人知覺到的環境失序，但，社會連結能夠正向顯著預測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不過同時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也同樣能夠正向顯著預測社會連結，但社會凝聚力與信任，以及社會連結對於對社會控制有共同期待皆無影響。因此，未來仍是要再進一步確認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兩變項間的因果關係，以利確認社會連結在台灣社區中所扮演的角色。

六、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根據Weisburd, Groff與Yang (2012)的研究指出，雖然過往有關社會解組理論的研究皆是使用較大的地理單位，如社區(neighborhood)作為測量單位，然而，他們指出使用小的地理單位較能夠了解整個犯罪的趨勢。Weisburd 等人的研究即是使用街道(street segment)作為研究單位，結果發現集體效能能夠顯著預測犯罪率，因此，他們建議在討論一地區的犯罪問題，以及預防方案時應該要將小的地理單位納入討論。據此，本研究最初所欲達成的目標，便是希冀能夠與政府單位聯繫取得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以街道為單位的資料。首先，我們需要的是各街道地址的資料，詢問過內政部戶政司、各縣市政府戶政單位，皆是得到受限於個資法，他們無法提供資料。此外，研究團隊也多方詢問研究先進過往研究經驗的資料取得方式，因此也曾與中選會，以及各縣市的選委會聯繫，詢問是否能夠提供選舉人名冊資料，同樣也可以從選舉人名冊獲得地址資訊，然而同樣也是被以個資問題而婉拒。

受限於地址資訊的取得困難，本研究最終只能從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以及高雄市民政局的網站下載街道資料，台中市政府部分則是透過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自行下載整理街道資料。取得街道資料之後，再利用內政部戶政司提供的村里街路門牌查詢系統，輸入街道名稱後取得門牌。然而，這樣的方式所得到的門牌資料並不精確，雖然研究團隊與郵局做過確認，郵局表示內政部提供的門牌資料是正確的，但實際上，郵局退件表示查無地址的問卷就有將近六百份，甚至，研究團隊至台中進行面訪時，也實際走訪被退件率較高的街道做查看，結果發現部分街道其實實際上是有地址的，但因郵務疏失而遭到退件。此外，研究團隊也無法得知，沒被退件的部分是否有順利寄送抵達，僅是受試者不願填寫問卷寄回，抑或又是郵政疏失未將有問題的郵件退回給研究者，這樣也會造成問卷回覆率計算的誤差。

因此，受限於地址資料取得的問題，本研究最終無法使用以街道為單位來寄送問卷，因為研究團隊無法確認正確街道與地址，也由於無法確定正確的街道與

地址，本研究也無法劃分出以村里為單位的區域來寄送問卷，最終僅能使用行政區作為研究單位。因此，希望未來研究能夠突破資料取得困難，能夠以較小的地理單位作為測量依據，這樣研究結果對於理論的解釋會更好。

除了地址資訊取得問題之外，根據文獻的討論，本研究是希冀針對台灣社區犯罪部分做討論，然而，本研究同樣無法取得犯罪資料。研究團隊首先也是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做聯繫，去文說明研究目的，以及需要以街道為單位，去個人資料識別(因此不會有侵犯個資法問題)，自民國89年至102年的暴力與竊盜犯罪案件發生數量的統計資料。然而，刑事警察局來文表示因街道數量甚鉅，其處理系統並無統一代碼進行填輸，因此無法以街道名稱做檢索提供研究所需的犯罪資料。除了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聯繫外，研究團隊同時也有與各縣市政府的警察局、主計統計單位做聯繫詢問取得資料的可行性，但同樣受到婉拒。

本研究在取得以街道為單位的犯罪資料受限，街道與地址資料取得也受限，但可使用以行政區為單位的資料，因此，研究團隊轉以詢問是否能取得依照各縣市以行政區單位的犯罪統計資料。各縣市政府於網路上皆有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於台北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中，有統計以行政區為單位的犯罪資料，然而，於台中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以及高雄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的犯罪資料皆是以分局作為統計單位。與台中市與高雄市的主計單位連繫過後，僅表示無法提供以行政區為單位的資料。之後也使用過內政部統計處查詢網，並再次與內政部警政署連繫詢問犯罪資料取得問題，然而，皆獲得這是現有的警政統計單位計算方式，即是針對分局作統計，無法另外做彙整及加總的回覆。至於台北市統計資料庫的網頁是台北市政府自行做彙整，並且指出台北市這樣彙整方式也會造成統計誤差，因為有些案件可能有跨行政區的問題。

由於犯罪資料取得受限，本研究僅能針對現有問卷資料進行分析，主要是針對居民的被害恐懼感，以及對環境失序知覺兩部分做討論。也因為以行政區為分析單位，雖然有台北市的犯罪資料，然而，將台北市的個人資料以整合(aggregate)方式加總，轉變為以行政區為單位的變項後會面臨樣本數不足問題，因此也無法

進行分析。因此，希望未來研究能夠取得犯罪資料，深入分析瞭解社區的人際網絡、凝聚力以及共識對於該地區犯罪的影響。此外，受限於資料蒐集因素，本研究目前是以迴歸進行分析，然而，Kubrin 及 Weitzer(2003)認為，HLM 可以同時評估社區結構特徵的直接影響，以及社區與個人變項之間的相互作用(p.392)。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能使用 HLM 進行分析，可以將社區不同的結構特徵與個人特徵的影響區分開來，了解社區結構特徵，以及社區的犯罪率是否會對個人的社會連繫與集體效能產生交互作用，更能夠清楚的更能夠清楚的驗證不同因素對個人行為與知覺的影響。

參考文獻

外文部分

- Adams, R. E. & Serpe, R. T. (2000). Social integration, fear of cri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3(4), 605-629
- Abdullah, A., Marzbali, M.H., Bahauddin, A. & Tilaki, M. J. M. (2015). Broken windows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Do they affect fear of crime? *Sage Open*.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doi: 10.1177/2158244014564361
- Bellair, P. E. (1997).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ty crime: Examining the Importance of neighbor networks. *Criminology*, 35(4), 677-703.
- Bennett, S. F.(1995).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crim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9, 72-84.
- Bedford, O. & Hwang, Kwang-Kuo. (2003). Guilt and shame in Chinese culture: A cross-cultur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and identit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3(2), 127-144.
- Bian, Yanjie & Soon A. (1997). Guanxi networks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 *Social forces*, 3, 981-1005.
- Brown, B., Perkins, D.D. & Brown, G. (2003). Place attachment in a revitalizing neighborhood: Individual and block levels of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3, 259-271.
- Browning, C. R. (2002). The span of collective efficacy: Extending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to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833-850.
- Browning, C. R., Feinberg, S. L. & Dietz, R.D. (2004). The paradox of social organization: Networks,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violent crime in urban neighborhoods. *Social Forces*, 83(2), 503-534.
- Bursik, R. J. Jr. (1986). Ecological stability and dynamics of delinquency. *Communities and Crime*, 8, 35-66.
- Bursik, R. J. Jr., & Webb, J. (1982). Community Change and Patterns of Delinquenc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1), 24-42.
- Bursik, R. J. Jr. & Grasmick, H. D. (1993). *Neighborhoods and crime: The dimensions of effective community control*.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 Carr, P. J. (2003). The new parochi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way case for arguments concerning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 1249-1291.
- Earley, P. C. (1993). East meets west meets mideast: further explorations of collectivistic and individualistic work group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 319-348.

-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 1360-1380.
- Granovetter, M. S. (198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 201-233
- Cullen, F. T. & Agnew R. (2006). *Criminological theory past to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Gibson, C., Zhao, J., Lovrich, N.P., & Gaffney, M.J. (2002). Social Integration , Individual Perceptions of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Fear of Crime in Three Cities. *Justice Quarterly*, 19, 537-564.
- Guest, A. M., Cover, J. K., Matsueda, R. L. & Kubrin, C. (2006). Neighborhood context and neighboring ties. *City & Community*, 5(4), 363-385.
- Hwang, Kwang-Kuo.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944-974.
- Hunter, A. J. (1985). Private, Parochial and Public Social Orders: The Problem of Crime and Incivility in Urban Communities. In G. D. Suttles & M. N. Zald (Eds.),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ontrol: Citizenship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Modern Society*.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 Kasarda, J. D. & Janowitz, M. (1974).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328- 339.
- Kornhauser, R. (1978). *Social sources of delinquenc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Kubrin, C. & Weitzer, R. (2003). New direction in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40(4), 374-402.
- Kwak, Jun-Hyeok. (2012, December). Non-domination and “shame” culture: Reconsidering criminal punishment in republicanism. In Kim, Seon-Wook (Chair), *Political of Shame in Northeast Asian Context*. Political Theories in East Asian Context Joint Workshop, Chiayi, Taiwan.
- Mazerolle, L., Wickes, R. & McBroom, J. (2010). Community variations in violence: The role of social ties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in comparative contex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 3-30.
- Morenoff, J. D., Sampson, R. J. & Raudenbush, S. W. (2001). Neighborhood inequality,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urban violence. *Criminology*, 39(3), 517-560.
- Park, R.E. & Burgess, E.W.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Sampson, R. J. (2012).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mpson, R. J., & Groves, W. B. (1989).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rime: Testing social dis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4), 774-802.

- Sampson, R. J. & Raudenbush, S. W. (1999). Systematic social observation of public spaces: A new look at disorder in urban neighborhood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603-651.
- Sampson, R. J., Raudenbush, S. W. & Earls, F.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 918-924.
- Sastry, J. & Ross, C. E. (1998). Asian ethnicity and the sense of personal control.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1(2), 101-120.
- Shaw, C. R., & McKay, H. D. (1942).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urban area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Simons, Ronald L., Simons, L.G., Burt, C.H., Brody, G.H., Cutrona, C. (2005). Collective efficacy,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and delinquency: A longitudinal test of a model integrating community- and family-level process. *Criminology*, 4, 989-1029.
- Sutherland, A., Ian Brunton-Smith & Jackson, J. (2013). Collective efficacy, deprivation and violence in Lond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3, 1050-1074.
- Vold, G. B., Bernard, T. J. & Snipes, J. B.(2002).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Warner, B. D. (2007). Directly intervene or call the authorities? A study of forms of neighborhood social control within a social disorganization framework. *Criminology*, 45(1), 99-129.
- Warner, B. D. & Rountree, P. W. (1997). Local social ties in a community and crime model: Questioning the systemic nature of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Social Problems*, 44, 3-24.
- Weng, Guo-Fong . (2007). The Research of the Effect of Collective Efficacy on Community Residents' Fear of Crime. *Journal of Criminology (Taiwan)*, 10(2), 115-144.
- Weisburd, D., Groff, E. R. & Yang, S. (2012) *The criminology of place: Developmental patterns and risk and preventive facto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Zhang, L., Messner, S. F. & Liu, J. (2007).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risk of household burglary in the city of Tianj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9, 918-937.
- Zhang, L., Messner, S. F., Liu, J. & Zhuo, Y. A. (2009). Guanxi and fear of crime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9, 472-490.

中文部分

- 石友馨(民97)。家庭教養行為、社區鄰里與自我概念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碩士論文)。取自<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id/98052043561512414800>
- 李素馨(民89)。都市住宅社區形式與居民被害恐懼感關係之研究。都市與計劃，27，25-45。

陳淑娟、董旭英 (民95)。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影響因素之研究。犯罪學學刊，9，31-52。

周新富(民98)。教育研究法。台北市：五南。

蔡德輝、楊士隆 (民 97)。犯罪學。台北市：五南。

附件

附件一 倫審通過證明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uman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審查通過證明

成大倫審會(簡)字第 103-027-2 號

案件編號：103-021

計畫名稱：台灣社會中的犯罪控制：比較社區中的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之效應

計畫主持人：楊曙銘助理教授

計畫執行機構：國立中正大學

核准日期：103 年 5 月 8 日

有效期限：104 年 7 月 31 日

審查文件與版本日期：

1. 研究倫理審查申請表 (103.5.8)
2. 研究計畫書 (103.5.8)
3. 計畫相關文件：(103.5.8)

附件_倫理課程證明

附件_招募參與者文宣

附件_研究計畫問卷_訪談

附件_研究計畫問卷_郵寄

附件_參與研究同意書_訪談

附件_參與研究同意書_郵寄

郵寄問卷 0501

期中報告繳交截止日期：104 年 5 月 7 日

結案報告繳交截止日期：104 年 10 月 31 日



附件二 科技部同意函

查 核 印 發	科技 部	書函	檔 號： 保存年限：
		地址：10622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06號 承辦人：伍承哲 電話：(02)2737-8010 傳真：02-2737-7566 電子信箱：soa203@most.gov.tw	
		受文者：國立中正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科部綜字第103007424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機構申請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楊曙銘助理教授變更為朱群芳教授一案，本部同意，其研究主持費由繼任主持人支領，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機構103年10月9日1031009FA10001電子文。	
		二、計畫編號：MOST102-2410-H-194-050-SS2(犯罪防治學系楊曙銘)	
		正本：國立中正大學	
		副本：	
		103/10/16 17:05:47	
		科技部	

附件三 倫審計畫修正證明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uman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修正計畫結果通知

朱老師群芳 您好，

您之前針對 103-021 「台灣社會中的犯罪控制:比較社區中的社會連結與集體效能之效應」計畫所提出的第 1 次修正申請-1.研究團隊成員修改(變更計畫主持人)，業於民國 104 年 6 月 11 日經本校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

☒ 通過

☐ 不通過

故該計畫：

因原計畫主持人楊曙銘教授因職務調動因素，故計畫主持人變更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朱群芳教授執行。

未來本會將持續追蹤您的這項計畫，您如遇計畫再度修正或與研究參與者相關的突發事件，亦請主動通知本會。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美智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6 月 1 1 日